

端午的铜铃

张林

文化村的碱草仍在风中起伏,却再闻不到新麦饼混着炊烟的香气。唯有那串铜铃,总在端午时分,摇醒我记忆深处的旧时光。

1976年端午前,天还没亮透,周大爷就拄着枣木拐杖出门了。他右腿是修跃进渠时被冻土砸断的,空荡荡的裤管扫过磨得发亮的乌拉草鞋。生产队把八头猪崽子交给他,每天他都赶它们去西边甸子。那件洗得发白的粗布褂子,后襟还沾着昨夜修补猪栏时蹭上的草屑,领口磨得发亮的蓝布兜,装着喂猪的零碎。

“瘸腿猪信晃三晃,猪崽跟着啃麦芒!”我们几个背着补丁擦补丁书包的永利小学孩子,总爱追在后面起哄。周大爷也不恼,从磨得起毛的蓝布兜里摸出炒黄豆:“尝尝,留种的新豆子。那可是队里精挑细选的好货,平时我都舍不得吃。”有次我故意拽住他衣角,他一个趔趄,却用整个身子护住布兜,额角的汗珠“啪嗒”砸在铜铃铛上。那铃铛是他拿当时能换半袋白面的三斤粮票,跟供销社老王磨了半天才换来的。每次摇晃,草窠里的鹌鹑就扑棱棱乱飞。

周大爷就是这样,总是默默帮衬着村里每一户人家,哪怕自己行动不便,也从不推辞。村里都说猪信这活又脏又累,可他把猪场收拾得比谁家都利落。开春麦苗冒头,他就着田埂挖野菜,裤腿常被苍耳勾得全是刺;三伏天日头毒,他砍柳条搭凉棚,手掌被竹篾划得鲜血直流;麦收时推着独轮车运麦秸,车轮陷进垄沟,他就单膝跪在泥里,咬着牙连车带草往上拽。

记得张三家孩子发高烧那晚,大雨下个不停。周大爷二话不说,蹚过齐膝深的泥水,在泥泞里深一脚浅一脚,把大夫请到了家。回来时,他整个人都成了泥人,可脸上还挂着笑,说孩子没事就好。那些年我生病时,他也总会摸黑送来几个煮鸡蛋,鸡蛋还带着他怀里的温度。

那年端午,月光把麦垛染成银灰色,艾草的苦香混着露水漫过来。鸡刚叫头遍,母亲就把我从热乎的被窝里拉起来:“赶紧给周大爷送鸡蛋去!”我套上补丁擦补丁的蓝布衫,跟着端粗瓷碗的母亲出了门。村口早聚了好些人——王婶粗糙的手在围裙上擦了又擦,才踮着脚往铜盆里撒雄黄;张大叔用麻绳捆着刚出锅的黏豆包,眼镜片被热气蒙得白茫茫一片,却还紧紧攥着,生怕凉了;平日里最嫌弃猪粪味的赵二婶,别过脸红着眼眶,猛地把艾草塞进周大爷怀里:“要不是你卖了大花猪给我凑手术费……”话没说完,就扭过头去,用袖口使劲抹眼泪。

远处传来熟悉的铜铃声。周大爷的枣木拐杖敲在发烫的石板路,粗布褂子浸着深色盐渍。看到村口的人群,他猛地停住,拐杖在碎石上打滑,惊得猪群“哼哼”着乱转。“老周,尝尝我包的黏豆包!”王婶的铜盆重重磕在他背篓上,溅出几滴雄黄水。张大叔握住周大爷布满裂口的手,把红纸包的鸡蛋硬塞进去,久久不肯松开。周大爷粗糙的手指抚过红纸,突然转过身,对着老井台的方向抹了把脸。

等他转过来时,眼角还闪着泪花。晨光染红了东边的麦垛,他挨着老柳树坐下,猪群拱着他的瘸腿蹭痒。剥开黏豆包的热气扑在脸上,这个总笑呵呵的汉子,突然像个孩子似的呜呜哭起来,泪水滴在沾满草屑的衣襟上。

后来我才知道,在文化村,端午给猪信送吃食是老辈传下的规矩。可周大爷的好,哪是规矩能说得尽的?想起有次赵二婶说起这事,眼眶又红了。谁家遭了贼,他披着破皮袄守整夜;外村盲人老头路过,他把自己的口粮分一半。曾经追着他起哄的孩子们,如今也都散落在天涯。

考上县里高中那天,周大爷塞给我一兜煮鸡蛋,铜铃铛系在网兜上叮当作响。解放牌汽车开出老远。我回头望去,他还站在甸子边,粗布褂子被风吹得鼓起来,像一只疲倦的鸟,收拢不住岁月的羽翼。

文化村的碱草仍在风中起伏,砖瓦房早已取代老井台。每到端午,野蔷薇开得烂漫,却再嗅不出记忆里的温度。曾经一起在麦地里疯跑的伙伴们,如今不知去向。我站在旧址上,恍惚间,那串铜铃混着周大爷的吆喝、猪群的叫声,又在空荡荡的甸子上回荡。原来岁月能吹散炊烟、抹平井台,却抹不去心底最暖的回响。



回想儿时,乡下人过的节只有三个,就是春节、端午节和中秋节。

上岁数的人习惯把春节叫过大年,把端午节叫五月节,把中秋节叫八月节。至于元宵节、清明节、七夕节、重阳节以及“完国”“五一”“十一”什么的,都不当回事。单说那元宵,只是听说过,却没见过过什么样,更不知道是啥味道。

或许与东北的气候有关,在盛产大苞米的黑土地上,很少见到麦子的影子,也就很少吃到麦子磨出来的白面。每逢过端午节或中秋节,生产队会通知各家,按人口数每人交给生产队一斤小米,然后派大车去粮食所统一兑换回白面,差价待年终结算时候再给补上。面粉拉回到生产队的喂马站,再招呼各家端着盆子或拿着面口袋去领取。有一年端午节领面,跟我同龄的二孩子没有把领到的面在盆里按实,从喂马站出来刚走到院子,刮来一股旋风,把他端着的那盆面,吹跑了差不多一半,结果到家后挨了一顿打。

那时,只有过大年每个人才可以换二斤面,就是说,加上端午与中秋两个节日,每个人一年里仅能吃到四斤白面而且家里还得留一些面粉用于打裕褙、糊窗户、糊墙什么的。如果能吃到一张饼或几个包子,那就不错了。只有等到大年三十的晚上,才能吃到一顿白面饺子。白面如此紧张,乡下的端午节只能吃黄面。将黄米淘洗干净,晾在一头垫高的桌面上渗水。等到干爽后,便到生产队的碾房里排队,因为这时家家都碾黄米。那几天最辛苦的要数生产队的毛驴,被套在碾子套里,戴着个蒙眼睛的罩子,一拉就是一天。

过去在乡下并没听到有关粽子的事或见过这东西。现在回想一下,倒觉得当年的黄米与今天的粽子有异曲同工之处。每淘一次黄米,碾成的面够全家人吃上好几顿,所以一般要用泥质的“二盆”来和面。“二盆”是一种大号的黑色泥瓦盆,盆口的直径足有两尺。黄面在二盆里和好,盖上秫秸帘,放在炕头上发酵一宿,第二天早上就可以烙豆沙馅的黄面饼子了,也可以做黏豆包、年糕、油炸糕、豆面卷子什么的。

北方的端午节,并没有什么赛龙舟活动,但有采艾蒿、挂纸葫芦和抽荷包的风俗。当天一大早,人们到野外采回艾蒿,采回来后插在房檐下,也有泡在脸盆里的,说是用艾蒿水洗脸可以驱蚊虫。我还见过东院的四姥把艾蒿别在了头上,说是治头疼病。这一天,家家都做几个五颜六色的纸葫芦,挂在门旁和幔帐杆上。那时候弄不到五色纸,就用过年时积攒下的香烟包装纸代替。再就是手巧的农妇用布条做成小荷包,还带有一把微型小笤帚,戴在孩子身上,说是可以除病。这些风俗都有各自的典故,寓意大都是讲要做心地善良的人,便可以逢凶化吉,避灾祛病,健康平安。

儿时的端午

冯旭东

